

1509/05

昌黎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昌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编 辑：刘玉忠 邢荣武 胡光理 张 上
张桂芳 郭凌芸 董宝瑞 王来雨
孙乃斌 王世杰 母幼平

封面题字：刘玉忠

封面设计：申玉德

摄 影：王世杰 赵胜会

前 言

文史资料工作是政协的一项重要任务。我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坚持广征博采、存真求实的方针，于一九八六年编辑印刷了《昌黎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受到各界人士的一致好评。它不但为社会科学研究、文艺创作和教学提供了翔实可靠的资料，而且在对后代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等方面都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现在，《昌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又问世了。在此书征集、整理、编辑和印刷的过程中，许多部门和各界人士给予大力协助，付出了辛勤劳动，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的水平不高，加上调查研究工作做得不够，难免出现错误和不足，殷切希望关心我县文史资料工作的政协委员、各级领导和各界朋友给予指正。

昌黎的历史悠久，蕴藏着丰富的文史资源，仅此两辑，只是在万花丛中采摘的几朵小花。今后我们将继续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广征博采，重点抢救，进一步深入开展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以便为这项惠及当代、泽延子孙的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昌黎县政协主席 赵维均

一九八九年六月

目 录

父亲和昌黎五峰山·····	李星华 (1)
李大钊的老师赵辉斗·····	董宝瑞 (7)
投笔从戎 以身殉国·····	母幼平 (10)
三次解放昌黎的经过·····	熹 晖 (16)
回忆我的父亲张振基·····	张建中 (21)
回忆我的父亲张鸿逵·····	张桂栋 张桂植 (25)
热心家乡教育事业的汪华堂先生·····	董宝瑞 (29)
汪华堂生平考略·····	汪兆骞 (34)
昌黎新中罐头公司的创办与戴家的支援·····	郭世同 (40)
风雨中的革命摇篮——忆昌黎县抗日中学·····	郭安邦 (42)
特殊的战斗·····	赵际增 (46)
悠悠往事忆昌黎·····	萧 芳 (53)
为抗日献身的张义堂·····	董宝瑞 (65)
在战犯所前后·····	陈静波 (68)
我的生平事略·····	陈静波 (73)
“戊辰兵灾”始末·····	熹 晖 (81)
“古田大佐纪念碑”的由来·····	董宝瑞 (89)
叛徒刘成玉的一生·····	董宝瑞 李宝田 刘耀宗 (92)
昌黎的文物古迹·····	王世杰 (97)
鸿兴戏院·····	齐志鸿 (100)
胜利剧社在昌黎·····	赵克明 (106)
皮影界的“梅兰芳”——高荣杰 ·····高泽民 王义梅 郭兴权	(113)

从事皮影戏表演艺术四十年之回顾·····	齐永衡 (116)
农民诗人宋作人的一生·····	马瑞翔 董宝瑞 (123)
著名昌黎民歌手——曹玉俭·····	王世杰 (127)
昌黎城关第一个戏院——群仙茶园·····	赵克明 (129)
从“双兴达”到百货公司文具店·····	张大地 (139)
昌黎酒与昌黎葡萄酒厂·····	洞箫 (135)
昌黎的吹歌艺术·····	高洪章 (141)
靖安清真寺的建立、圯毁和修复·····	郭凌芸 (145)
薛家营村的天主教·····	陆春林 新宇 (149)
安山万家·····	李宝田 刘耀宗 (152)

父亲和昌黎五峰山

[李星华]

我的老家大黑坨村在渤海边上，从村外向北望去，可以隐隐约约看到远处有耸入云层的灰楚楚的高峰，那就是昌黎的碣石山。父亲在幼年的时候，这个碣石山就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神往。以后，他到天津北洋法政大学读书，暑假中和两三个同学一块回家，路过昌黎，曾特地停下来，到碣石山游览了几夭。这也是他第一次游昌黎五峰山。后来，他来五峰山就不止一次了，他还曾经带领我们全家大小到这里来游玩。但最值得回忆的是，他在这个世外桃源似的碣石山里，遇到过一件最使他感到不愉快的事情，就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打死了五个路警，再就是他曾经两次到山里避难，五峰山变成了他向敌人隐身作战的地方。

一九一三年，父亲从天津法政大学毕业，当年秋天便到日本东京留学去了。在出国的前几天，他和两位朋友又到五峰山旧地重游。这一次，他游遍了五峰山和附近各处，看了那里所有的名胜和秋景。他特别看了水岩寺和玉液泉，看了游人留下的许多诗文和刻石，他还把《游水岩歌》和别的诗句抄写下来，而且从碑文上研究了明末范志完将军扼守昌黎抵抗清兵入侵的历史。他还向当地群众了解清兵入关时老百姓坚守昌黎城的英勇事迹。据说那时清兵围攻昌黎约七天七夜，没能破成，以后因急于进占燕京，便放弃昌黎直取北京了。

父亲这一次到五峰山韩文公祠只住了十来天。没料到，在这样短暂的日子里，他却遇到了一桩他认为是“弥天之耻辱”的事。

事情原来是这样的：有一位水果商贩，夜里在车站上卖水

果，有个日本鬼子从他的果筐里抢水果。一个值夜班的路警，刚要问明原因，日本鬼子上来便殴打路警。就为了这件事，日本队官佐野哲太郎率领大队人马，把铁路警察局包围了。佐野哲太郎亲自用长刀戳死了警察局的巡长，并下命令向警察开枪，当场又打死了四名路警。五个人的尸体泡在血泊里，很久没有人敢来收尸。一直等到第二天中午，才由家属把尸首装殓起来，将五口棺材由警察局抬到了昌黎城北地藏寺。

父亲和他的两位朋友，听到了发生暴行的消息以后，急忙赶到地藏寺，看了抵抗日寇的牺牲者。他们亲眼看到五口棺材冷冷落落地摆在寺院的中央，不断有人前来看望，看的人都异常愤慨。这五个人昨天还在为中国铁路的安全服务，现在已经被蛮横无理的日本侵略者不但没有因此负罪受罚，还依旧在我们的国土上大摇大摆，耀武扬威。而我们当时的卖国政府，对于这样的耻辱不仅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甚至后来又对日寇无耻地献媚讨好，在县政府里设备了茶点、啤酒，把日本驻华铁道部长田中忠三郎请来，向他赔礼道歉。县长在双方欢谈的茶会上居然说什么“同种同文”，“两国应当更加亲睦”，而且称赞了一番东京的风景如何好，五位路警被杀的事却一字没提。父亲在这条事上非常激动，后来他在自己的谈话和文章里，曾经几次忿忿不平地回忆到这件事，并且殷切地希望，凡是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不要忘记这个“弥天之耻辱”。他说：“山盟海誓，与日寇不共戴天，有如碣石。”

不久，父亲就带着与帝国主义不共戴天的仇恨，到日本留学去了。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北洋军阀把新文化运动看成洪水猛兽，反动政府给进步教授扣上“过激派”的帽子，许多进步刊物都在“妨害治安，败坏风俗”或“鼓吹革命”的罪名下被查封了。八月二十四日，北京政府司法总长朱深派遣武装

爪牙，也封闭了父亲等人主编的《每周评论》。父亲从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就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联的革命经验，他自然早已成了北洋军阀的眼中钉，是反动政府想要捉拿的一个“过激派”了。《每周评论》被查封以前，父亲正在昌黎五峰山避居。这次父亲到昌黎山里来与往次不同，除了带着一个装满书籍和笔墨纸张的小手提箱以外，还带了我的哥哥。那时哥哥只有十一二岁，他们父子俩一块住在看守韩文公祠的刘克顺家里。他们的山居生活是非常有规律的，父亲把最好的时间用来看书写文章，但无论怎样忙，也要挤出些时间督促哥哥复习功课。他日夜紧张地进行写作，疲劳的时候，也常到附近山里游览或散步，日子倒也轻松愉快。

韩文公祠在五峰山的半山腰，座北朝南，幽雅清静。父亲和哥哥住在正殿东边的三间屋子里，正殿西边的两间小屋，是看祠人刘克顺老两口子住的地方。房屋背后就是五峰山顶。

一个夏天，父亲在五峰山上看了很多书，写了不少文章，他的那封批驳胡适反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公开信《再论问题与主义》，就是这次在这里写的。胡适仇视革命，充当北洋军阀和资产阶级代言人，写了一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向马克思主义开火。父亲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严正地批驳了胡适的谬论，并且公开承认自己是喜欢谈谈布尔什维克主义的。紧接着，他夜以继日地撰写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长篇论著《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父亲就是这样充满战斗精神，严肃而愉快地在昌黎山上度过了一个夏天。

一九二四年春天，第一次国共合作，父亲从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回来不久，反动政府警察总监王怀庆就以“共产党首领”的罪名，下通缉令逮捕父亲，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又到五峰山韩文公祠来了。这是父亲到昌黎的深山里躲避军阀政府的

缉拿，也可以说是他与五峰山最后的一次告别。这次来，父亲从北京动身以前，稍稍化了一下装，把两撇惹人注目的小黑胡剃掉，打扮成了一个生意人的模样。为了掩蔽敌人耳目，又是哥哥陪伴着一块儿来的。他们父子两人随身带着两个轻便的软包袱，从北京搭京奉晚车，次日天刚蒙蒙亮就到了昌黎。他们下车后，没有像以往那样先到城里的大德增客店，而是直奔山里，又在看祠人刘克顺的家里落了脚。刘克顺老两口，象往常一样，用松子烧茶欢迎远来的朋友。父亲和哥哥又来到这幽静的环境里，不象从前那样常到山前山后游逛了，父亲每天坐在屋里看书写文章，哥哥闷了的时候，看他带去的一本《镜花缘》。

有一天的黄昏时分，父亲站在房屋前的扫帚柏前面，正透过花砖墙向外眺望山中的远景，忽然看见在果树林里，白云深处，时隐时现地有两个人影向五峰山这个方向走来。父亲觉得很奇怪，这么晚了，还有谁到这深山里来呢？当那两个人走近的时候，他才认了出来，原来是一位同志和我大舅的儿子希增。父亲把他们让到屋里以后，叫希增和哥哥到外面台阶上去玩，小心有闲人到祠堂里来游逛，如果有什么情况，叫他们赶快回来报信。那位伯伯原来是给父亲送紧急通知的，党中央派他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三天以内就要到北京去和其他代表一块动身。那位同志除了完成重要任务以外，又把母亲托带的一封信交给了父亲。

送通知的同志走了以后，父亲从母亲的那封书信和希增的口里，知道了他离京后家里发生了一连串事情。当他和哥哥走出家里的第二天晚上，警察总监王怀庆果真派便衣军警到铜幌子胡同甲三号的住宅里逮人来了。但他们没有料到竟扑了一个空，气得只好在家里乱翻了一阵，扫兴而去。第二天，我们全家在姨父的带领下，乘京奉晚车，回到了乐亭老家。就在我们全家刚回到乐亭不久，警察总监王怀庆又派遣他的爪牙从北京追到乐亭缉拿父

亲，当然照样又扑了空。母亲厉声告诉匪徒们说：“他没回来！”匪徒们的骚扰，给我们村庄增加了一些麻烦。我们庄的会头们，用酒肉招待了王怀庆的爪牙们一场，把他们应付走了。匪徒们从北京到乐亭县来捉人，下、上火车都恰好飞不过昌黎，但他们偏偏越过了父亲避居的五峰山。可是，母亲因为这次通缉令十分担忧。她在信里和父亲商量，她打算写信给白坚武，请白设法把通缉令取消，这样作法是否妥当，希望父亲给一个明确的回答。父亲看到这些话，急忙提笔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父亲粗略地回忆了他自从到广州以后，反动政府对家里进行的一连串的迫害：流氓寻衅、“疯狗”叫门、盗贼施展恐吓手段，等等。他说，这种无耻的迫害是吓不住他的，统治者丑恶狰狞的面貌，在他的面前反而暴露得更为鲜明，更使他增强了斗志。他在信里把反动统治者形象地比作纸老虎，说那个纸老虎的寿命是不会长的，它是禁不住冲天的革命烈火燃烧的，那张不起任何作用的通缉令，更没有什么可怕。他在信里还说了这样的大意：写信给白坚武大可不必。过去同窗的时候，虽是好友，但在去年“二七惨案”发生以后，我们就绝交了。他在直系军阀幕下摇翎打扇，而我却站在革命的一边，就是亲胞兄弟，站在敌对战线上也是常有的，何况我与白坚武？……

父亲在这封信里还说：现在，我的工作很忙，今后再没有空闲的时间照顾家庭了，你应当坚强起来，千万不要为我的生活颠沛流离所焦急，应当振作起精神抚养和教育子女。我这次出国说不定什么时候回来。钟华的死，确使我很伤心，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闲心想念她了。我已经替他写了一首长诗，作为对她最后的哀悼吧！

信的最后，父亲还那样充满了乐观主义，充满了信心地说：“目前统治者的这种猖狂行为，也不过是一时的恐怖罢了。不出十年，红旗将会飘满北京，看那时的天下，竟是谁人的天

下！……”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父亲就把给家里写好的那封长信和一些书籍、零星衣物交给了希增和哥哥，叫他们带回家去，交到母亲手里。他又把来时带的那个小包袱精减了又精减，但里面却增添了哥哥的那套《镜花缘》。一切准备妥当，临走时他又对哥哥说：“这套《镜花缘》我带走了，好在路上看看。以后你要是想看，等回到北京时再买一套罢。我到莫斯科以后，就给 你们 来信！”

父亲一个人走出韩文公祠时，仍然还是他来的那个打扮，背着一个轻便的小包，象一个行庄生意客人一样。这时正是桃、杏花盛开的时节，苹果、海棠也正含苞欲放，碣石山变成一架花山了。但是，他再顾不上欣赏这些明媚的春景了。从那以后，他也不再没有来过他所多次留连的昌黎五峰山了。

李大钊的老师赵辉斗

董宝瑞

李大钊在考入永平府中学之前，先后在本村和外村的三个学馆读书，教过他的私塾先生分别为单子鳌、赵辉斗、黄玉堂。其中赵辉斗与其家有密切关系，为其得以求学深造起到重要作用。

赵辉斗，字奎光，河北省昌黎县大滩村人，约出生于清朝道光年间，歿于宣统年间。在世八十多年。其家境贫寒，父亲为一个以教书为业的私塾先生，靠到处教书维持全家人的生计。赵辉斗弟兄三人，他排行为大，二、三弟名辉山、辉元。弟兄三人均为读书人，长大后都以教书为生。赵辉斗自幼随父求学，考中诸生后曾到北京国子监读书，但屡试也未中举，仅为诸生。这使得他不得不继承父业，沿着父亲的足迹到处任教执鞭，后来成为闻名昌黎、乐亭的私塾先生。他爱文艺，长于吟咏，诗词歌赋之作均佳，曾得到乐亭县的进士孙国祯特别赏识。生前，他著有《自娱轩吟草》。为此，他的生平事迹被载入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重修的《昌黎县志·艺术志·文苑传》。据《昌黎县志》记载，他除在艺术上有成就外，还十分孝敬父母，爱抚弟弟，言其“性成待两弟怡怡然，有姜家大被风”（“姜被”典故见《后汉书·姜肱传》，用以称颂兄弟间的友爱）。

赵辉斗家居大滩，拜师访友、执鞭任教的活动地区主要在乐亭县的大、小黑坨一带。那一带距大滩村较近，行走方便。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其父生前曾在那一带任教多年，结交了一些好友。据说，赵辉斗父亲曾经在大黑坨赵家学馆任教多年，与学馆主人——李大钊夫人赵纫兰的祖父赵良佐认祖归宗，情同手足。他就是在赵家学馆任教时患病，回家后不久辞世的，病故时

年仅四十多岁。由于两家是世交，赵辉斗常在大黑坨赵家落足，与赵纫兰的父亲赵文隆相交甚笃。据说，赵辉斗到北京国子监求学，就是赵文隆资助的。可见，两家的关系在赵辉斗成年时已不一般。而赵文隆与李大钊的祖父李如珍关系也不寻常。两人曾一起在东北经商多年，赵文隆为东家，李如珍为掌柜的，合手经商致富后，赵文隆花钱捐了一个官位，李如珍也捐了一个“从九品”的衔。他俩双双荣归故里后，分别把两家设为“福臻堂”和“怀德堂”，成为村中有名望的大户。到这时，赵辉斗已通过赵文隆，同李如珍结为好友。李如珍年老无子，见弟弟李如珠的儿子任荣年幼聪慧，便过继为子。李如珍晚年得子，对李任荣寄予很大期望，自然要让其拜赵辉斗为师。李任荣成为童生后，不幸患了肺病。光绪十三年（1887年），村西华严寺置买香火地基，由李如珍督办。事情办成后，需立碑，李如珍请赵辉斗撰写了碑文，而书写由李任荣提笔。据说，李任荣当时已病得不轻，是铺着毯子在碑上趴着写的。如今，这块碑仍存放在李大钊故居纪念馆院内，碑文落款为“督办人从九品李如珍”、“昌黎县增广生赵辉斗撰文”、“童生李任荣书丹”。其碑文不落俗套，可以看出赵辉斗文思敏捷，学识饱满。碑上的字为楷书，笔划均匀，苍劲有力，可看出李任荣书法功底非浅。可以说，这是赵辉斗、李任荣师生笔墨文思的珠联璧合。

李任荣是在书写华岩寺碑之后一年半去世的，李大钊在他病逝七个月后诞生。出于对李家的友情，出于对学生李任荣的怀念，在李大钊出生以后，赵辉斗仍常到李如珍家走动，对自己得意门生的“遗腹子”的成长十分关心。李大钊到七岁时，被送到本村谷宗海家的私塾，跟教师单子鳌学习启蒙知识。这时候，赵辉斗已转到小黑坨张玘璞为其独生儿子张春回设的专馆任教，但仍时常来过问李大钊的学习情况。三年后，李大钊已学完启蒙阶段的知识，需要学习进一步的功课，而单子鳌已不能胜教。这时，只

有跟赵辉斗学习才能深造。对此，赵辉斗早有谋算。他借口张春回一人学习太孤单，应找伴读，极力向张家引荐李大钊。小黑坨张家号称“京东快马张”，是乐亭县数一数二的富户，一般是很难插进其家专馆的。赵辉斗凭借的是自己多年在那一带任教的威望，再加上自己与赵、李两家的关系（其时李大钊与赵纫兰结婚，成为赵文隆的三姑爷），使得张家碍于情面，只好答应让李大钊到专馆就读。李大钊到张家学馆时，赵辉斗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他为使李大钊学有长进，几乎倾尽了毕生的心血。在老人的精心培育下，李大钊的学业进步很快。可惜，两年以后，就在李大钊进一步向老人学习时，张家的独生儿子张春回不幸病死，专馆无法再办下去了。赵辉斗见状心急如焚，不顾年迈，凭自己多年交友执鞭结下的关系，终于在井家坨宋家学馆给李大钊找了一个位置，让李大钊从师黄玉堂继续求学，而自己鉴于年事已高，就自此罢鞭，回乡安度天年去了。可以说，李大钊是赵辉斗晚年收的最后一个学子。赵辉斗回到大滩村后，对李大钊的学习仍很关心，当得知永平府中学堂招生时，他找到李如珍、赵文隆，极力主张李大钊去应试。可惜李大钊十四岁那年去应试，因染卷或其他原因，未被录取，两年后再试，才考进了永平府中学。

赵辉斗是在李大钊到天津继续求学深造以后才病故的。据后人介绍，老人一生最自得的，除乐亭进士孙国祯有知遇之恩外，就是与大黑坨赵、李两家结交，再就是晚年收了李大钊这么一个有前途的好学生。

赵辉斗遗有二子，长子树仁，次子树德，均为读书人。他的二儿子赵树德（字滋川）后来曾到北京找李大钊，住在李大钊家多日，由李大钊介绍到国民党部工作。他无子女，认李大钊妻兄赵小峰的大女儿赵锡杰为干女儿，后来将赵锡杰带到南京，解放前夕去了台湾。也就是说，赵辉斗的后代与李大钊的一家仍有较密切的交往。

〔据访问李葆华、赵树欣、陈金霞等和参阅有关资料整理〕

投笔从戎 以身殉国

——韩立平烈士生平

母幼平

韩立平是昌黎县参加革命较早的同志。他毕业于昌黎县乡村师范学校，曾任小学教师，因经常替人书写诉状，帮人辩护，又称“韩大律师”。本文根据其生前亲友回忆，记述了烈士生平片断，以慰忠魂。

艰难的年代 聪颖的孩子

韩立平，名志午，自幼家境贫寒，父亲给石各庄地主永聚兴（堂名）扛活，哥哥当学徒。立平从小勤奋好学，向母亲恳求上学念书。母亲叹息着说：“孩子，咱家连饭都吃不饱，哪有钱供你念书？”穷人的孩子懂事早，看到母亲难过的样子，立平再不提念书的事了。可是当他看到一般大的小伙伴进出学校，非常羡慕。他每次拾柴回来，都把柴篓放在校门外边，悄悄到教室窗外，偷听老师讲课。老师清晰的讲解声，和小朋友们琅琅的读书声，他听得入神，手里还拿着草棍在地上写字。时间长了，热心的杨宪庭老师，发现了年少好学的立平，把他叫到办公室问道：“你愿意念书？”

“嗯。”立平不好意思地回答。

“好！”杨老师说：“明天你就来上学，我给你找书，也不收你的学费！”

立平感动得流着眼泪跑回家去，第二天就高高兴兴上学了。由于立平学习刻苦，各门功课都名列前茅。到了四年级时，立平就显示了写作上的才华，经常受到老师的称赞，有时，还把他的

作文当范文念给同学们听。有一次，全县作文比赛，老师让立平参加。作文题目是《论“卫生”》，立平构思敏捷，挥笔而就。他写道：“人之一生乐强健乎？乐疾病乎？甚矣。卫生之道不可不讲。善卫生者，必饮食有节，运动有时，作息有一定之规，卧起有一项之则。此，卫生之道也……”寥寥数语，结构严谨，说理透辟，令人叹服。这篇作文得了双奖，受到主考的前清秀才、县教育局长卢子兰的赞赏。

热心教育 宣传革命

韩立平于昌黎县乡村师范毕业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曾在沈阳、洮南等地做地下工作，负责学生运动。当时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占领了我国东北，日本人在我国的土地上横行霸道，欺压百姓。立平忧国忧民，不畏强暴。有一次，立平因事去朱家坎（现改为黑龙江省龙江县），在车站旅馆前，见到两个日本兵拦截、调戏一位卖烟卷的年轻姑娘，拿了姑娘的烟卷，还动手撕姑娘的衣服。面对日寇这种野蛮行径，立平怒不可遏，上前大喝：“住手！这是中国土地！光天化日之下，如此胆大妄为，是何道理？”日本兵眼冒凶光，伸手就打。立平手疾眼快，拳脚利索，抓起一个日本兵摔出两米多远，接着又出其不意地痛打了另一个日本兵。这时，卖烟卷的姑娘趁机逃出虎口，在群众的掩护下，立平也逃出洮南。

“九一八”事变后，立平从东北回到关里，在昌黎县田上庄教书。他工作勤奋，成绩卓著，他教的班总是名列全县榜首。他选派十三名学生参加县会考，有八人成绩突出，获得奖励，受到邻村乡亲们的夸赞。因此，韩营村委托校董韩星五，亲去田上庄邀请立平回本村任教。立平回到故里，一面教书，一面利用人地两熟的方便条件，进行抗日工作。不论茶余饭后，村边地头，家访、集合等机会，他都要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也随时向学生灌

输进步思想。一个冬天的夜晚，立平带领学生韩敬、韩作善、韩鼎丞等去邻村桃园看皮影。在回来的路上，他边走边启发学生：

“你们看这茫茫夜路坎坷不平，实在难走。但是只要你向前走，就一定迎来灿烂的黎明。”他又意味深长地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形势，就像眼前这坎坷的夜路一样，胜利的曙光就在前头！”

立平也在公开的场合宣传抗日。有一次“九一八”国耻纪念日，全区教师、学生在刘台庄镇集会。立平在会上公开发表演说：“……军阀擅权，政客构衅；连年混战，忧患频仍，外强入侵，家国不宁，国难当头，人人有责。我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均应奋起抗争，以解国家全卵之危，救民倒悬之苦，务不使我神圣国土辱临倭奴之手……”立平声音宏亮，慷慨激昂。会场上人人感奋，掌声雷动。

立平学识渊博，善诗词、音乐、美术，特别善长书法。他的行书大字，苍劲神奇。村里不少人家墙壁上，悬挂着立平书写的字画。为给学生印制仿影，立平亲手书字刻制木版。有块珍贵的木板和一篇他给人代书的遗嘱，到现在还陈列在昌黎烈士陵园纪念堂。立平经常写诗，通过凝炼的语言，高度集中的感情，去感染、鼓励学生刻苦学习，勇往直前。

廿载光阴转瞬过，
前尘回首怅蹉跎。
十年辛苦鸡窗冷，
半世飘零铁砚磨。
人骨犹如梅骨瘦，
愁丝更比藕丝多。
眼前恨逢荆棘路，
振奋精神执斧柯。

立平在这首七律《抒怀》中，把自己的命运和社会生活，紧